

论傅兰雅之“求著时新小说”

陈 大 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活动在近代小说研究中一直得到较高的评价。通过对傅兰雅有关征文活动的文字以及应征来稿的分析,可以发现这次活动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应征者多为教徒,应征稿多非小说,它对近代小说的发展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与后来的“新小说”也并无关联。但这批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由此可从一个方面了解外国传教士的思想和活动、各地教会组织的运转、教徒们的心态、社会中下层人们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思索,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等等。

关键词:傅兰雅;时新小说;近代文学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申报》上刊载了一则《求著时新小说启》: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自清咸丰十一年(1861)到香港起算,傅兰雅在中国已渡过34个年头,而自同治四年(1865)以后,则一直生活于上海。他担任过上海英华学堂校长,主编过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创办了格致书院,长期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还荣膺清政府赠与的三品文官头衔。光绪二十二年(1896),离华赴美,可以说,这次向社会征集小说,是他在中国筹划的最后一次活动。为此,他在宣传造势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上述启事五月初二刊载后,他又在当月初五、初七、十二与十六日在《申报》上接连刊载,同时又刊载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从福建省的教会刊物《会报》转载这则启事来看,^①他似乎与各省的教会刊物也联系过。此外,傅兰雅又用英文另撰广告刊于《教务杂志》。

近年来,一些近代小说研究者对傅兰雅征集小说的活动甚为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有的称其为“近代小说理论的起点”^②,有的则认为“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③由于尚未发现傅兰雅所征集的稿件,这些判断均是仅据那则启事而作出。至于应征者的那些稿件写了些什么,又写得怎样?论者当时其实都不知道,但这似乎并不影响肯定性判断的作出。美国学者韩南论及“可能162篇手稿全部已佚”时曾言:“如果它们还存在,单单以这个数字来看,它们会给当

① 宋永泉:《启蒙志要》,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以下凡出自该书者只注册次)。

② 陈亚东:《近代小说理论起点之我见》,《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时的小说界开辟怎样的一个新天地!”^①傅兰雅在公布获奖名单的两个月后离开中国,那批稿件也被他带到美国,后来便杳无音信。一直到2006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在搬迁时,才发现了这些尘封已百余年的稿件。虽然只是发现了150篇,尚有12篇下落不明,但傅兰雅征文活动的基本面目据此已可知晓,故而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五年后,这批稿件由周欣平主编,取名为《清末时新小说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者书前的序言中称,傅兰雅的征文活动“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②随着这套书的出版,有关论文也相继发表,这次征文活动被充分肯定则一仍其旧。有人认为傅兰雅此举“拉开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序幕”,^③或者定位为“启发了晚清小说乃至谴责小说的发展方向。”^④可是,纵观这150篇应征稿以及傅兰雅关于这次征文活动的相关文字,却可发现上述种种赞扬颇可质疑,因为若要对这次征文活动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作恰如其分的定位,就不可脱离围绕那些相关文献所作的切实、具体分析的基础。

我们还是先从傅兰雅的启事以及征文活动的过程说起。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傅兰雅在《申报》、《万国公报》上刊载征文启事,同时在英文《教务杂志》上以“有奖中文小说”为题刊登广告,内云:

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鸦片、时文、缠足的弊端有生动地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学生、教师和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多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它们将会满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收据会寄给所有在农历七月末之前寄送到汉口路四百零七号格致书室傅兰雅密封好的手稿。^⑤

《申报》与《万国公报》上所载启事属于广而告之的性质,它面对的是社会上所有的阅报人,而《教务杂志》上这则广告的读者则是特定的人群,即文中所提及的“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这意味着傅兰雅将教会机构当作征文活动赖以依靠的组织系统,而明确指出是要征集“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表明了傅兰雅的计划中,这次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一个月后,傅兰雅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摘录了艾德博士对有奖小说征文的一段评论,借以说明这次活动的宗旨:

一篇写得好的小说会在大众头脑中产生永久性的巨大影响,《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唤醒民众反对奴隶制上就非常有效。中国现在罪恶猖獗,鸦片、缠足和时文,任何一种都够写一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为了让这些悲惨遭遇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注意,就应该通过文字描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这方面的能力。^⑥

此时距征文启事发布只有一个月,还不可能收到应征者的来稿,但傅兰雅的期望值却已在升高。上述文字之所以被引用,表明他确实希望在希望能收到“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而且那些作品能“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从引文中最后一句话来看,傅兰雅似乎已认为活动的圆满成功触手可及了。

按征文启事的规定,来稿“限七月底满期收齐”。收到应征者的稿件后,傅兰雅又邀请沈毓桂、王韬、蔡尔康等知名人士,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审阅与筛选。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6年1月13日),傅兰雅在《申报》上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启事,宣布征文活动结束:

前求著小说,共收一百六十二卷,现已评定甲乙。本议只取七名,旋因作者过多,特增取至二十名,皆酬润资。计茶阳居士五十元,詹万云卅元,李钟生廿元,青莲后人十六元,鸣皋氏十四元,望国新十二元,格致散人八元,胡晋修七元,刘忠毅、杨味西各六元,张润源、枚甘老人各五元,殷履

①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② 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

③ 刘琦:《晚清“新小说”之先声》,《北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④ 许军:《傅兰雅小说正文目的考》,《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

⑤⑥ 此段译文据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

亨、倜傥非常生各四元，朱正初、醒世人各三元，廖卓生、罗懋兴各二元，瘦梅词人、陈义珍各一元半。余另列一纸，可至格致书室取阅，酬洋亦至该处领取。傅兰雅启。

按常理推断，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在宣布顺利结束之时，应该有番兴高采烈的称颂才对，可是这则启事只是纯客观地罗列了获奖人的名单与所获奖金数，一点也感受不到举办者对于成功的喜悦，这与当初的征文启事流露的恳切、期待或自信的心情不甚协调。这次征文活动到底是圆满成功还是结果很不理想，从这则启事里看不出主办者的丝毫评价。当年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好奇，如果是圆满成功，为何主办者未表示出丁点喜悦？如果是结果不理想，为何得奖人数却从原先约定的七名猛增至二十名？评选当自有标准，它不应因参加应征者人数多寡而变化。得奖人数猛增，那应是优秀稿件实在太多，难以割舍，可是现在公诸于众的理由却是“因作者过多”，这显然是企图安抚应征者渴望得奖的情绪，人们据此可以猜测，来稿的实际情况恐怕不妙。在《申报》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启事的三个月后，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傅兰雅又分别在英文《教务杂志》第二十六期和《万国公报》第八十六册上刊载了征文活动结束的消息。在《万国公报》刊载的启事抬头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小阳春中旬格致汇编馆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也就是说，在《申报》发表启事之时，供《万国公报》刊载的这则启事也已撰成，可是傅兰雅就是一直拖着不发表，直到他临离开中国前才向社会发布。英文《教务杂志》和《万国公报》发表的消息对这次征文活动都有评价，但两者却是一褒一贬。同一人对同一事同时作出的评价竟有极大的差异，这也令人好生奇怪。

这些矛盾以及不同内容的消息发布时间的选择，都反映了傅兰雅为难与尴尬的心情。在他看来，这次征文活动是既成功又不理想。所谓成功，是因为它的各个环节，从在各报刊刊载启事、收到 162 篇来稿、组织人员审阅、最后宣布得奖名单，一步步走来都算顺当。他后来高比例安排获奖数，也是有意让世人以为这次征文活动十分圆满。另一成功之处，是教会的组织力量得到了体现。傅兰雅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刊载的启事明确表示希望“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能动员教徒们“踊跃参加这次比赛”，从应征者中教徒比例如此之高可以断定，傅兰雅并不只是“希望”，而是实实在在地对那些牧师们做了发动与宣传工作，牧师们也确实响应了他的号召。

教徒们的稿件几乎都是交给传教士们，再由他们寄往上海，而阅读那些来稿或应征者写给傅兰雅的信，可以了解各地教会如何宣传并组织教徒们参与这次征文活动。据宋永泉的应征稿《启蒙志要》可知，他是看到《万国公报》与福建《会报》刊载的启事后，才决意“仿《天路历程》寓意之例”应征的。^①各地传教士采用种种方法通知教徒参加征文活动，山东济南府的李凤祺是“前于后五月间，适有友人在浸礼会抄示题纸”，^②这是当地教会在发布消息，而教徒们辗转相告；福建惠州府的赖作枏，是“本闰夏中浣，日侧游园，忽接大英国傅君即兰雅翁‘求著时新小说启’一题”，不难想见这启事由谁转交到他的手里；^③广东巴色会的古恩纶则是“本年夏间，有友人寄来‘求著时新小说’一纸”；^④浙江绍兴府的祝鉴堂“兹因五月间有美国甘先生将招著小说之启授仆”^⑤才动了参加征文活动的念头。山东青州府张德祥的情况也类似：“余方看《新约》一书，忽有人送题到，上有三题，命作时新小说。”^⑥派人将启事送到教徒的家里，当地教会的工作可谓周到尽心，而“命作”二字，可见这已是当作业布置。湖北孝感县的福音会堂是这次来稿的大户，该会堂的陶牧师还亲自将教徒们的那些稿件送至上海格致书室傅兰雅处。那 15 篇稿件使用的都是统一的稿纸与信封，连稿件的题目也都是统一标为《鸦片时文缠足小说》，统一组稿的印记十分明显。可惜是除了赵怀真的那篇还可算作小说，其余的全为数百字的议论，而且内容也大同小异，如“要食救主鱼饼，不吸毒烟鸦片；要读圣神《书》、《约》，不尚虚假时文；要学夏娃大脚，不可爱

① 宋永泉：《启蒙志要》，《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② 李凤祺：《《无名小说》所附信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③ 赖作枏：《时新小说》篇首语，《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

④ 古恩纶：《中国宜力除鸦片、时文、缠足三大害以觐富强之兆说》篇首语，《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

⑤ 祝鉴堂：《论鸦片烟、论时文、论裹足》所附信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

⑥ 张德祥：《鸭（鸦）片、时文、缠足》篇首语，《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小缠足”^①之类。当收到这批由当地牧师亲自护送到沪的文稿,那位“傅老先生”阅后不知会有何感想。山东济南府长老会的高书五也与孝感县的陶牧师一般热心,“寄耕子”就写道:“光绪乙未,适游济南,有旧友潍邑高君书五携《万国公报》一卷示余”。^②可是高书五组织来的 4 篇稿件,或为韵文,或为议论,小说却是一篇也无。滦州李景山所写的《道德除害传》是由唐山耶稣教会的德牧师转交的,^③但这篇也不是小说。正是靠着各地教会的认真操办,使傅兰雅能收到近百篇稿件,尽管其中多数不是小说,但这个基本数量保证了征文活动的规模效应。相比之下,消息来源主要靠平日读报的非教徒们属于自发来稿者的“散户”,如“格致散人”是“适阅申江日报”得知征文一事,^④而“瘦梅词人”《甬里消夏记》第一回的回目为“余菊英遣愁看《申报》,傅兰雅设法兴中华”,这显为他消息的来源。^⑤他们所提交的确为小说,分别为第七名与第十四名获奖者。其他如“停云馆主”,他是“见《申报》英国傅兰雅君招人作戒烟文”^⑥,才动笔撰写应征。

就现存的 150 篇作品统计归类,可将来稿的分布情况以下表显示。表中被归入“教徒”者,是根据来稿的署名称呼,以及作品中称颂“天主”之类的内容作判断;表中的地区,则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作归类:

地区	小说			非小说			总计		
	教徒	非教徒	合计	教徒	非教徒	合计	教徒	非教徒	合计
江苏	0	8	8	1	2	3	1	10	11
浙江	0	1	1	2	2	4	2	3	5
山东	9	5	14	16	9	25	25	14	39
直隶	2	1	3	2	1	3	4	2	6
广东	7	2	9	10	5	15	17	7	24
福建	5	1	6	5	5	10	10	6	16
湖北	4	0	4	14	2	16	18	2	20
江西	0	1	1	2	0	2	2	1	3
安徽	0	0	0	5	0	5	5	0	5
陕西	0	0	0	1	1	2	1	1	2
地区不详	3	3	6	4	9	13	7	12	19
总计	30	22	52	62	36	98	92	58	150

由上表可看出,教徒的来稿占了 61.33% (实际情况可能还更多些),可是教徒的来稿中,小说仅占 32.60%。得奖的 20 篇小说中,4 篇已佚,所余 16 篇得奖小说中,教徒的作品只有 5 篇,占 31.25%。从另一角度看,教徒 92 篇作品中,得奖者占 5.43%,而非教徒 58 篇作品中,得奖者占 18.97%,即得奖比例为教徒的 3.5 倍。傅兰雅和他邀请审阅的人士,在评定时并未因应征者是教徒就另眼相看。

那么,这些教徒在作品中写了些什么呢? 我们不妨先考察那些得奖作品。望国新的《时新小说》为获第六名之作,全书四十回,前二十回集中讲述鸦片的弊害,后二十回分别以十回的篇幅批评缠足与时文。书中两个主人公对立而设,一名“明更新”,一名“尚喜故”,两人命名含义,一望便知,但所谓“更新”与“喜故”的实质差异,只是在于是否信奉上帝而已。该篇名曰“小说”,其实不仅没有贯串全书的故事,就连零星插入的小故事也鲜见,通篇是靠对话、议论支撑。如叙至废时文,最后一回就写明更新竭力劝化文国华,不断讲述信奉上帝的益处,还送他一本《圣经》,于是废时文的目的就达到了:

(文国华)卓志信道,与教中诸友时常往来,久而愈坚。后国华亦领洗进教,引妻率子同归教

① 毛芝生:《戒鸦片时文缠足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② 寄耕子:《寄耕闲论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③ 李景山:《道德除害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
④ 格致散人:《启达观道人闲游记》,《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
⑤ 瘦梅词人:《甬里消夏记》,《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五册。
⑥ 停云馆主:《戒烟文》篇前短简,《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主，又竭力引导许多儒士。国华信主之后，以《圣经》为紧要，以时文为末节。^①

这篇所谓的“小说”通篇弥漫着说教的气味，连它的回目也是“改烟良方从天来，须奉救主蒙赦罪”、“各国圣贤皆天降，耶稣之教超万圣”、“富强之基在斯教，得明救道毕生从”之类。获第八名之作篇名也叫《时新小说》，署“青州府临淄县教末胡晋修撰著”。其内容描写石南岗进学后学坏了，整日出入花街赌场烟馆，后因误伤人命，逃亡在外。作者借其经历，穿插了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后来石南岗接受洗礼入教，一改以往恶习，失散多年的弟弟也回来了，“自此兄弟叔嫂，早晚在家礼拜真神，圣日赴礼拜堂赞美上帝。”^②总之，只要信奉上帝，三害尽可革除。

获奖作品尚且如此，余者则等而下之。不少教徒将这次参加征文活动，当做了向教会表忠心的机会。李景山写《道德除害传》，就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那《经》上的言语，都是他的吩咐，全是他的命令。若能照著他的话去行，就可以修身治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可以赶去诸般大害，可以救活自己灵魂。^③

福建的魏开基写《悟光传》，首先是开宗明义：“幸主心仁慈，主道广布，能救人脱其害，且能使人得其益，而要非信主者不能也。”^④，山东青州府的“无名氏”撰写了《时新小说》二篇，通篇尽是诸如“天父赐良知我们，我们无恩可报，感谢，感谢”之类颂扬上帝之语，而且篇中凡书及“上帝”、“天父”二词，均顶格书写，以示尊崇。^⑤同为青州府的王连科，在他的《时新小说》第一回中就描写胡为领《圣经》入教会，“一旁喜的那他老娘拍手打掌的说：‘可好了，可好了！俺一家人家有了出头之日了。’”^⑥大王堂支会的张佃书写了《无名小说》，特意说明“讲道之处，皆由《圣经》脱化而出”，^⑦即若要革除三弊，全得依仗《圣经》。陈效新的《时新小说》则在篇末称颂道：“夫天父也，救主也，圣神也，三位合一上帝也。诚以此信德神通，确乎天人至宝也。冀学而明，明而诚，兴盛富强之旨在是。”^⑧湖北曹东阳的《回原纯古传》全为唱词，而篇首的“俚歌”则唱道：“改弦易辙家国家富，定在悔悟信深深。一人悔改百人遵，百人遵时千人承。千而万斯遍天下，人人皈依道岸登。不特上帝心喜悦，更免罪魔入沉沦。从兹兰雅大愿舟，渡尽天民朝至尊。”^⑨最后两句将傅兰雅赞至极尊崇的地位，而所谓“渡尽天民”，似是希望全中国的百姓都成为教徒。“东海逸人”的《警世奇观》，则以篇末诗点题：“生平作事枉徒然，今是昨非信可言。一旦皈依遵上帝，儿孙世世福绵延。”^⑩

为了使自己的稿件入选，一些教徒还煞费苦心，别出心裁，以图傅兰雅之青目。孝感县福音会堂的赵理斋一口气写了四篇，或韵文，或议论，最后还从《新约》中所集录三十八个“圣洁”以及耶稣事迹之出处。此稿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但与小说却毫无关系。^⑪山东即墨的董文训特地写信给傅兰雅倾诉自己的艰辛，他是全靠挤时间才写成《崂山实录》应征，因为“乡间以度日为要，弟子助父兄做庄稼”。既然写作如此不易，他感到理应得到回报，明确提出，“弟子所望者登报”，若不能得到名次，也希望傅兰雅能帮忙，“即登《月报》、《画图新报》”。^⑫福建的沈桂香不仅在篇前写信给傅兰雅，“伏愿傅兰雅夫子及考阅列位夫子，发慈悲心，行阴鹭事，细心评阅，刊行于世。”篇末又再次恳求：“千万恳求傅兰雅先生及阅书列位先生大发婆心”。他在信中还透露自己有非同一般的官场关系：“小生客岁五月初八日，曾与母舅王总起程到上海接福建提督黄大人到任，并游赏光景。”希望这一点也能打动傅兰雅。^⑬此举或可

① 望国新：《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

② 胡晋修：《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三册。

③ 李景山：《道德除害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

④ 魏开基：《悟光传》序，《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⑤ 无名氏：《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

⑥ 王连科：《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

⑦ 张佃书：《无名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

⑧ 陈效新：《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

⑨ 曹东阳：《回原纯古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九册。

⑩ 东海逸人：《警世奇观》，《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

⑪ 赵理斋：《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⑫ 董文训：《崂山实录》，《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⑬ 沈桂香：《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六册。

证明这位应征者对官场上的一套似有所了解,但如此热衷却暴露了自己对《圣经》一点儿也没有参透。福建惠州府的赖作枬也有类似举动,他在应征文的开篇处就自我介绍了曾经做过“德领事府宪西席”的经历,表示早已与西洋人有渊源关系。^①当然,多数人摆不出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于是他们便直接对“傅老先生”歌功颂德,如“今有英国大儒士傅兰雅先生,心怀济世,念切生民,广救沉沦之辈,深怜陷溺之人”^②,又赞其“盱衡当世,旷览輿情”^③。而傅兰雅征文之举,则被称颂为“固先生救世之苦心所积而形也”^④，“苟非其爱我中国之深，而望我中国之切，安能有此？”^⑤甚至还称颂为“是必惟救世主出，见中国之众遭荼毒，盗虚声，受缚束，种种情形，不忍坐视”^⑥。至于声明自己是“在教人”^⑦，希望傅兰雅判卷时能有所优惠，则几乎是教徒们来稿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倒是一些非教徒显得较为豁达，作《戒烟文》的“停云馆主”在给傅兰雅的信中就表示：“如不入式，覆瓿可也。若以为可，仍有润笔之赐，请交赈局。”^⑧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的要求是“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即以小说的形式，通过讲述故事，既要同时充分暴露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而且还要设计革除三者弊害的方法。就“小说”一条而言，大部分来稿无法达到要求，更遑论“新趣”。若不论来稿是否为小说，那么在揭露鸦片、时文与缠足弊害方面基本上都能做到，只是不少来稿讲得较为抽象，但能“合显”者只是少数。至于“祛各弊之妙法”，则可谓是五花八门，我们这里不妨作归类考察。对于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的方法，教徒们想出的方法高度一致，即信奉上帝。其中一些人，讲得十分空泛，仿佛只要捧读《圣经》，按其吩咐去做，问题就全解决了；只要信奉了上帝，就百害无侵，什么鸦片、时文、缠足，都不在话下。正如湖北的教徒汤纯所言：“以上帝之身为身，则道成人身，而鸦片无庸，时文无庸，缠足亦无庸，何至害身？水火除，刀兵息，瘟疫远，又何以害世耶？”^⑨这些教徒认为，中国大地上三害横行，就是由于大家不信教，“我华人久违上帝，亲近魔鬼，应招上帝诅咒，故有妇女缠足之惨”，原来这竟是上帝惩罚中国人的招数。至于嗜食鸦片，则又与中国人信奉佛教有关：“试看鸦片所结之实，仿佛释迦牟尼之首，且拜佛人与吸烟人之性体，无不若合符节。”^⑩在他们看来，“肯悔罪改过，相信救主耶稣，依从天道”是能否革除那些弊害的前提，因为“真实的福禄寿喜都在天道之中，藏在天上的，勿肯悔改的人不能求的，求不到的”^⑪，“而非信主者不能也”。^⑫有的来稿还提出了信奉上帝后革除三弊害的具体做法：“如有志，欲祛斯害。一则中华人民当戒鸦片，而祈食吗啡，愿尝鱼饼；二则中华儒士宜弃时文，而勤读《圣经》，专看《书》、《约》；三则中华女子不必缠足，而皆学利亚，应效夏娃。是害必可去，利必能获。”湖北孝感县福音会堂来稿中，有五篇都提出了这同样的解决方法。^⑬

既然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弊害的关键在于是否信奉上帝，那么顺理成章的推论，便是“引之信奉耶稣教为第一妙策”，“夫教中有良规，宜效法而行之”，如缠足之害，“现在中国奉教之女子多不缠足，即经缠之妇女，亦多放释”，他们似乎认为，这是颇有点说服力的典型例证。^⑭在他们看来，采用此法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大开国门，主动将传教士们请进来：“请西国教士，播圣道于国中，以变易人心然后

① 赖作枬：《时新小说》篇首语，《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

② 醒悟子：《无题》，《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③ 李星舫：《〈时新小说〉序》，《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

④ 桃源徒子：《〈法戒录〉序》，《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

⑤ 古恩纶：《中国宜力除鸦片、时文、缠足三大害以觐富强之兆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

⑥ 汤鸾翔：《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⑦ 赵荣林：《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⑧ 停云馆主：《戒烟文》篇前短简，《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⑨ 汤纯：《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⑩ 侯中识：《鸦片烟流毒问答、缠足致害问答、时文踵弊问答》，《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⑪ 陈之珊：《除弊兴利中国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⑫ 魏开基：《悟光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⑬ 周务三：《鸦片时文缠足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该册所载孝感县福音会堂赵禹臣、秦诚意、毛芝生、赵齐贤的四篇来稿，都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⑭ 林文玉：《四子讲弊新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始可得其尽善尽美焉。”^①二是要求百姓们全都入教，因为“士农工商入其教者，势必讲此道，行此理。信此道者，亦自去其邪，归其正矣。若望富强本国，变易风俗，感动人心，莫此为妙”^②。有的教徒还进一步提出，既然信奉上帝，信仰就不能多元化，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就必须摒弃，诚所谓“同尊上主，共事一神。更赖中保，将富强可待，郅治日臻。天国可到，天福可享，岂不懿欤？”^③当然，教徒们还不敢触犯众怒，与孔夫子为敌。他们面临的现状是中国的多数人“以为天下独中国为圣朝，亦独孔子为圣人，此外皆蛮夷戎狄也”，故而“常视耶稣正教为异端”^④。生活在这一环境之中，再加上能应征写稿者本人很可能也是儒生，故而竭力从中调和，而他们所能提出的主张，也只是孔子与耶稣可以并存，而且能够统一，按他们的说法，这叫“承道统圣生孔子，识天意教传耶稣”^⑤。但他们的感情又倾向于耶稣，因此强调的重点便是，“若设法使教会兴旺，这一切弊病自能扫除”^⑥。

只要信奉上帝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提出这种主张的颇似偏执的宗教狂，但实际上更可能是痴迷于信教的无知乡民。稍有知识的教徒固然也将信奉上帝视为第一要义，但似乎知道中国的事情复杂得很，要彻底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这三害，国家就应该改革。在华的传教士们在讲授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宣扬了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优越，于是那些接受了传教士宣传的教徒便很自然地提出了革除三弊的根本之计，那就是向西方学习，这是他们将中国与西方作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为国之要，在于因时变通；变通之要，不外持其源本。源本者，仿佛西人式样也。中国吸烟，西人无一吸者；中国作文，西人讲求各学；中国缠足，西人与各国均是本足，不受捆缚苦楚。西国不较中国胜吗？^⑦

经由传教士们的反复宣讲，教徒们入教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用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已是“素慕英国风化”^⑧，因此希望一切都向西方学习，“奉行西法”^⑨。在当时的中国，许多人还根本不清楚西方诸国是怎么回事，羡慕西方政治文化的更是很少的一些人，针对这一现状，有教徒在来稿中就设计了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即“请西师遍布国中，国学乡学一齐并举”，据说只要实行这样的方法，“不独鸦片之下三弊可除，即百弊亦从此而递次全消”。作者似也考虑到自己的设计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于是又写道：“使各当道臣士、搢绅儒士，其有不服以西学者，应宜亟出心裁，切勿相延观望，以误国家”。这话说得含蓄，但主张采用强制手段，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意味还是不难体会的^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教徒才主张效法西方，即使是非教徒，一些人在来稿中也同样提出了“求西国之新法，更中国之旧章”^⑪的主张。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要求变法维新已开始逐渐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要求全盘西化的思想在此时也已开始萌生。

上述主张都涉及中国与西方关系，而在这方面，有两篇来稿值得一提。一篇是载于《清末时新小说》第九册的《游亚记》，作者方中魁记叙了法国教士艾德普夫妇与慕维敦，在中国士人莫人俊陪同下游历中土时的身经目睹之事，“中国之弊政、颓风，亦于此见焉”。篇中论及鸦片之害时，莫人俊与艾德普有这样一段对话：

（莫人俊）因转问德普道：“闻说西国好善之士，因鸦片烟一物为害华人如此之甚，心内殊抱不安，每设会劝国家禁此鸦片，不知西国国家能俯从否？”德普道：“此事西国国家断不能从。因印度一隅，土产惟有鸦片，每年所收烟税，约可得银千余万。英国国家恃此以治印度之民，以理印度之

① 罗懋兴：《石琇全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五册。

② 汪可人：《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五册。

③ 谭尧培：《无题》，《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④ 古恩纶：《中国宜力除鸦片、时文、缠足三大害以觐富强之兆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

⑤ 李凤祺：《无名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

⑥ 郭子符：《驱魔传》，《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九册。

⑦ 沈立喆：《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一册。

⑧ 杨培之：《鸦片、缠足、时文》，《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一册。

⑨ 杨抡杰：《时新小说》，《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

⑩ 邓维新：《无题》，《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

⑪ 林芳田：《无题》，《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